

全球化大潮的深入，后冷战时代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均给当前族群治理带来一些新的特征，也增加了当代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国家建构难度。现代政治是一种通过宪法安排的政治治理，如何探求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宪法之路，既是当代中国公法学人一种无可回避的学术职责，也为当代中国的公法学人们如何挖掘真正的中国宪法问题提供了现实的思考方向。

因此，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问题，并不是某一学科如民族学或者民族法的专有研究对象，而是需要包括法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在内通力合作的一个复杂话题，而在这其中，法学所特有的直接面对制度构建的学科属性，有理由也有责任为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做出自己的学科贡献。

参考文献：

- [1]周平：《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6卷，[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109.
- [2]雷振扬：“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与时俱进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5）.
- [3]解志苹、吴开松：“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的重塑——基于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J]青海民族研究，2009（4）
- [4]张宏莉：“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队我国安全的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 [5]马戎、赵志研：“多元一体理论：拓展中华民族研究新视野”，[N]中国民族报.2008-8-9(005)
- [6]丁志刚：“政治学视野中的西北问题-----国家政权系统与西北地区治理”，[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 [7]关凯：《族群政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39.
- [8]金炳镐、龚志祥：“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与发展的几个问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1)
- [9]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0.
- [10]陈建樾：“以制度和法治保护少数民族权利”，[J]民族研究，2009(4)
- [11]靳薇：“项目援助与西藏经济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2008(4)
- [12]黄宗智、余盛峰：“改革中的‘地方—国家’体制重新发现政治空间”，[J].文化纵横 2009(6)

【论 文】

民国时期的“西藏”概念

——从 1926-1935 年间的五本《西藏问题》著作谈起

李 健¹

一、引言

2008 年“3·14 事件”发生之后，及随后发生的奥运火炬传递在国外遇到的风波，促成了海内外华人对“西藏问题”的一次空前聚焦，各种新闻报道一时铺天盖地，各种关于“西藏问题”

¹ 李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以及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评论、反思、研究骤然增多,使这一以往偏冷门的领域一时升温。在中国期刊网收录的1980~2011年的期刊文章中,题目中含“西藏问题”的共119篇,其中仅2008年以来的不到4年期间就有48篇,¹占40.34%,年均12篇;1980~2007年的28年总共仅占59.66%,年均2.54篇,前后差距非常悬殊。而这还不包括大量不以“西藏问题”为标题但讨论西藏问题的文章以及在港台地区发表的大量相关文章。在专著方面,汪晖先生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2011年出版)是最新的一部力作。此外,2011年还出版了郭永虎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2009年分别出版了张植荣的《中美关系与西藏问题——历史演变与决策分析》和卢秀璋的《美国对华战略和“西藏问题”1959-1991》。与此同时,一批关于“西藏问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也已完成。其他如中外媒体的访谈报道,数量更不可统计。由此可见近年西藏问题讨论的热烈,反映出西藏问题被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

同样,在中国近代还曾有一次热烈讨论西藏问题的高潮,就是民国期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1926年至1935年的短短十年间,就有五本题名均为“西藏问题”的著作问世,²而且其中有四本(包括再版)集中在1929年至1931年之间公开出版,这在中国的整个藏学史上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五本著作依初版时间分别是:谢彬著《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6/1930/1933/1935),³王勤培著《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1934),华企云编著,《西藏问题》(大东书局,1930),秦墨晒著,《西藏问题》(1931),陈健夫著,《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1937)。2010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边疆文献辑录》⁴收录了其中的三本,2011年出版的《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西南边疆 第二辑》⁵将五本全部收录。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五部著作无疑在某些方面有些过时,即便在当时,也不一定全部堪称是代表作,其他人撰写的讨论类似主题的重要著作也还有不少,⁶但如果回到民国的时代背景中,这些著作恰恰是当时那批精英思考西藏问题的完整记录。既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以“西藏问题”来命名自己的作品,至少说明“西藏问题”是他们当时关心的一个重要主题。⁷

在近年国内学者关于“西藏问题”的论述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不同角度深入梳理了西方人“西藏观”的发展演变过程。汪晖先生运用“东方主义”的工具,对西方人营造“神话西藏”的过程进行了深刻剖析,意在使西方人西藏观的本质清晰呈现出来,作为今天我们理解“西藏问题”的一个基础(汪晖,2011)。沈卫荣先生则在回应汪先生文章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学者对西方的“东方主义西藏观”的自我反省、批评和清算的过程。特别是文中提及了“东方人对东方文化传统中的西藏形象的观察和研究”,指出“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绝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并提及了西方学者提出的“内在的东方主义”概念(沈卫荣,2010)。但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梳理中国学者的“西藏观”的研究成果极少。

笔者受沈先生的启发。实际上,今天我们在思考“西藏问题”以及反思“西方人思考西藏问题的方式”时,对“我们自身思考西藏问题的方式”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顺着沈先生的思路,笔者试图选取一个历史的截面,即从民国时期的五部同名著作出发,来考察当时的知识界对

¹ 因为时间滞差,2011年的期刊文章还没有全部录入期刊网,因此实际数量应该会更多。

² 此外当时尚有外交部编《西藏问题》一书,查国家图书馆目录,有佚名编《西藏问题》五章,不知是否为同一书。另据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集)》一书的“参考书刊目录”中有“《西藏问题》,顾维钧(?)辑,民国外交部刊印”一条。

³ 括号中给出了该书的再版年份。

⁴ 中国近现代边疆文献辑录编委会,《中国近现代边疆文献辑录》,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⁵ 本书编委会,《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西南边疆 第二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⁶ 如白眉初著,《西藏始末纪要》(1930);尹扶一著,《西藏纪要》(1930)等。

⁷ 清末民国时期有一批内地的官员、学者、旅行家、僧人赴藏,他们根据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撰写了为数不少的纪实、游记和学术调查性的著作,但很少给自己的作品冠名为“西藏问题”;相反,本文涉及的五位作者都给自己的作品冠名为“西藏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没有亲身去过西藏(除秦墨晒提到在西藏短暂游历过)。



“西藏”这一概念的认识，梳理在他们的著作中，“西藏”这一概念到底为何？无论何时，对“西藏”概念的界定是讨论和思考整个“西藏问题”的前提与基础，梳理“西藏”概念的源流演变对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至少直到目前，在汉语、英语和藏语语境中，对“西藏”的理解仍颇多歧义。¹对“西藏”概念的讨论在五部著作中均有涉及，是当时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但远不是全部。五著中的其他重要问题，如“历史上中央与西藏的关系”、“晚清川边经营”、“民国康藏纠纷与内犯问题”、“英国侵藏及西姆拉会议”、“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及对西藏经济、社会、宗教、民族、风俗等的考察，今天读来，都是反映民国时期知识精英观点的极好文献。本文限于篇幅，暂不讨论。

二、五位作者——其人及著述

本文涉及到的谢、王、华、秦、陈五位先生的出生年代、籍贯、受教育背景、所从事职业都各有不同。这些不同正好反映了民国时期不同社会精英在共同面对“西藏问题”时所持有的各自观点。

谢彬，2 1887 年 5 月生于湖南省衡阳县一农家，先入私塾，后入新式的清泉高等小学堂和衡州府中学堂。1905 年加入同盟会。1913 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4 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 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参加了护国战争。次年，以财政部特派员身份，前往新疆考察，写成 30 余万字的《新疆游记》，为民国以来较早介绍西北边疆地理知识的专著，孙中山为该书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其后到上海等地工作，几年间完成多部学术著作。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告别仕途，退隐家乡潜心著述。抗战时期，一度受聘于湖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8 年去世（参见侯夏，1992：92—96；杨昌泰，2007：155）。谢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 1921 年，曾在《民心周报》上发表《西藏问题》和《西藏问题之研究》两篇文章（侯夏，1992：95—96）。其研究“西藏问题”的代表作就是 1926 年出版的《西藏交涉略史》和《西藏问题》，两书互有补充，可称为姊妹篇（刘国武，2010：185）。谢彬涉及边疆研究的著作还有《云南游记》（1924）、《中国丧地史》（1925）、《蒙古问题》（1926）等，其他非边疆研究的著述甚多。

王勤培，1902 年生于浙江慈溪慈城镇黄山村。字鞠侯，常以字行世。著名地理学家。少时就读于新式小学、中学，1922 年考入东南大学，师从竺可桢先生学习地学。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讲师，还曾任暨南大学教授、教务长，浙江大学分校教授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编目组主任等职（陈玉堂，2005：81；谢振声，2009）。³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有《西藏问题》（1929）、《蒙古问题》（1930）、《满洲问题》（1931），其他地理学方面著述甚多。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开明书店工作，1951 年去世，去世前曾为珠穆朗玛峰的正名做出贡献。

华企云，生卒年不详，近代著名的边疆研究专家，30 年代曾为戴季陶等创办的新亚细亚学会的领头人之一（叶罗娜，2007：25）。主要著作有《满蒙问题》（1929）、《满洲问题》（1930）、《蒙古问题》（1930）、《西藏问题》（1930）、《云南问题》（1931）、《满洲与蒙古》（1932）、《亚洲之再生》（1932）、《中国边疆》（1932）等。马大正先生认为其《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 1932 年初版，1933 年再版）一书，“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在 20 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大正，1996：138）。

¹ 在汉语、英语和藏语语境及各自的文化传统中，对“西藏”概念的理解及其演变极为复杂，笔者在此暂不作详细考证和讨论，仅就民国时期五位学者的观点展开讨论。

² 关于谢彬，国内多部近代人物辞书的记载几乎都有错误，将此谢彬与国民党一位同名的将领混为一谈，参见《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陈玉堂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20 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周家珍编著，法律出版社，2000 年，等工具书。

³ 另参见维基百科“王鞠侯”条。



秦墨晒，生卒年不详，是民国时期的老报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斌学校。和孙剑秋创办过“世界通讯社”。曾任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1938年8月1日，任《南京新报》社长，该报是南京地区日伪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是伪“维新政府”的机关报。¹ 其著述今天仅见《西藏问题》一书，由马福祥题写书名。该书在前半部分简略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及英帝国侵略西藏、川军入藏和达赖出亡的情形，其后用了超过全书一半的篇幅列出了当时存世的西藏研究文献目录，其中中文文献44种，² 英文文献223种，可见其收集之完备。

陈健夫，别名陈代锷，1913年生于江西省奉新县。曾任南京《救国日报》总主笔，改造通讯社社长，南京市参议员，台港“新儒学”创立者。1947年12月在南京创立中国新社会党，是当时合法成立的第一个反对党。该党赴台后停止了活动，1988年3月1日再次筹建该党，并任主席。1949年抵台后因反对内战被以叛乱罪判刑10年（实际关了三年半），出狱后从事文教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曾任新儒家通讯社、出版社及学苑负责人，是仅存的原中国社会党的元老级人士。在监狱期间融合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的学说，自创了“新儒学”。³ 主要著作有，《西藏问题》（1935/1937）、《王阳明学说及其事功》（1946）、《新儒学典》（1987）。《西藏问题》一书是作者在之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基础上撰写而成，被认为是“‘西藏问题’一类书中之杰作”（王尧等，2003:154）

除了谢氏和王氏外，目前可以查到的关于其他三位作者的生平资料很少，在各类人物辞典中，仅见关于谢、王的辞条，其他三位未见记载。关于这五部专著的评述极少，除谢氏的著作外，其他四部均无专文评述。王尧等人编写的《中国藏学史》一书提及了该五部著作，指出“本时期（1912—1937）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通论性的西藏史地著作也颇为丰富。尤其是以《西藏问题》为题的著作作为多⁴……这类著述大多大同小异，主要叙述西藏及川康藏区之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基本情况”（王尧等，2003:152-153）。⁵

由前述可知，五位作者都不是纯粹研究西藏的学者。⁶ 谢氏一生既从政又著述，且著述涉及的主题和范围很广；王氏是大学的教师，本身是地理学家，边疆研究并不是主业；华氏是当时比较活跃的边疆问题研究专家，著述范围远超出西藏；秦氏是记者出身，后在汪伪政权下从事报业，并不能算作学者；陈氏曾于1935年“蒙藏委员会蒙藏政治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后从事报业及党派政治，关于西藏的专著也仅此一本。因此，从职业身份看，五位作者中学者有两位，“亦政亦学”的两位，非学者一位。从族群身份看，应该都是内地汉族，主要是南方人。在著述首次出版时，谢氏39岁，王氏27岁，而陈氏年仅22岁。他们都应接受过新式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五位作者的不同个人特征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

五著依篇幅可分为两类，谢、王、秦三著算一类，篇幅均短小，华、陈二著算一类，篇幅较前者多出一倍，论述较详。依内容分，王、陈二著都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方策，其中陈著用六章专讲“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五本专著中最突出的；其余三本主要是论述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间或加以评论，其中秦著内容极简，华著则颇详。本文拟以谢著、陈著王著和华著为重点，兼及秦著，从作者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时空背景来理解和评论这些著作中对于“西藏”（包括康藏）的理解和界定。

¹ 关于秦墨晒生平的文献资料极少，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047043.htm>。

² 秦氏中文目录中仅见谢彬的《西藏问题》，因其收集的文献截止到1929年9月，其时其他四部尚未出版，故未收，另收有《西藏问题》，外交部编，铅印中装本。

³ 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692966.htm>。

http://www.china.com.cn/ch-haixia/gb/society/party/2_609.htm。

⁴ 作者将陈重为的《西康问题》（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作为《西藏问题》列入这一类书中，应有误。

⁵ 王尧先生等人所编的书在脚注部分对谢著、王著、华著的各章节题目进行了介绍，在正文中对陈著介绍较详，评价较高；认为秦著过于简约，略去未谈（秦氏全名“秦墨晒”，此书中作“秦品晒”，似有误）。

⁶ 五位作者中，谢、王、华三位都著有《蒙古问题》，王、华二位都著有《满洲问题》，可见他们对边疆问题的关注较为全面，并不局限在某一专题领域。



这五部著作发表时间前后延续近十年（1926—1935），在此期间西藏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总体上，大的时代背景未变，正好是抗战前国民党统治逐渐平稳的十年。1935年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再未发表过以“西藏问题”为题的通论性著作。

三、“五著”关于“西藏”的论述

（一）撰书的目的

在考察五位作者的“西藏”概念之前，先探究一下他们撰书的目的，因为这种目的很可能也会影响他们对“西藏”的理解。

五位作者撰书的目的虽各有侧重，总体上看还是有相当大的一致性。特别是其中中华、陈、秦三位在书中都写有自序，很清楚地阐明了著书的目的。谢、王二著未列前言后记，但正文中所发议论很多，也可反映他们的主旨。总体上看，处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著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救亡图存，知识救国；其次为引起国人对西藏的关注，提高对西藏的认识；第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关于西藏的基础知识；第四，论述“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剖析其实质，揭露英国的侵略野心；第五，为解决“西藏问题”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第六，为“到蒙藏去”的人提供参考。

陈氏在其自序中痛言：

中国边疆自清季以来，破碎崩溃，岂无已时。西藏地处西鄙，交通不便。因过去中央当局一味因循，而无一种具体计划，致使西藏与中央关系，日行疏远。倘吾人不急起直追，其危险诚关乎整个的大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国青年可不为其民族祖先力谋所以恢复之道邪？……诚以国事日促，非我辈自起，共图大计，不足以解倒悬。著者有志于斯，因专力研究藏事，今且一年。本平日之所得，著成此书，公诸国人。其目的在启发一般国民对藏事之认识，庶国人共起图之。……西藏久与内地隔阂，其地之实际状况，学者鲜能道之。中外关于西藏之新旧纪，内容多不完备，欲一完备之藏纪，洵为难得。因是所谓“解决西藏问题者”，往往误认西藏之历史背景及时代背景，其解决途径，自难免不合乎实际（陈健夫，1935：自序）。

陈氏的论述基本符合上述著书目的的前四条，而华氏的主要目的是使国人先认识西藏，然后到西藏去，其背后的深意仍是保卫国之疆土，因此在序言中说：

钱氏之言其立论在国人对于蒙藏智识之缺乏，而以“到蒙藏去”考察为归宿。其言诚属确论。……顾欲在短期间内“到蒙藏去”之实现，则尤非使国人对于蒙藏有相当之认识不为功。若欲其有相当之认识，则窃以为有三点首当注意：今以西藏为例，则西藏之本身如何，一也；西藏自来对华关系如何，二也；西藏之历次对外关系如何，三也；三者知而后可以语于认识西藏矣。区区斯编，其用意即在于是。敢效野人献芹之旨，公诸国人。其勿以言而忽之，而使三危旧壤，有覆亡之危焉。斯则幸矣（华企云，1930：自序）！

秦氏是五位作者中唯一在序言中提及自己到过西藏的人，其著作此书的目的同上述两位也很类似。首先是对边疆的担忧：

不过近年以来，中国处于军阀时代，国家的力量和国民的视线，完全被移到内争方面；对于民生问题和建设的实施，完全没有顾到；对于远在边陲的西藏，更是无暇顾及，现在内地虽然渐渐统一，但是边疆形势，一天紧张一天了（秦墨晒，1931：弁言）。

对于游历西藏、成书过程和目的的叙述：

作者几年前虽然到西藏去过一次，但因为是游历的性质，所以对于西藏没有充分的研究与认识，所以正和走马看花一般，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印象与记录。后来从国内外记载藏案的书中，得到许多的材料，抄写出来，略微把我从前的印象作参考，写成这本通俗讲话，附以小图。作者的目的是使国人知道西藏是怎样一个地方，对于西藏补救的办法应该怎么样（同上）。

与其他四位不同的是，秦氏对英人研究西藏的文献很熟悉，并深刻感受到了一种学术上的不



对等，因此很警醒地说：

英国关于西藏处心积虑，已经几十年了，他们所出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小册子，共计有二百数十种多，里面记载的情形，比我国格外详细，反之，我们是西藏的主国，所出亦仅四十多种，并且多是游记风景词章一类，中间关于政治外交的纪载，十分中只有一二，现在作者把我国所出各种藏务书籍和英国所出藏务书籍的目录，一个一个附在后面，因为这书是粗浅的，是预备着尚未研究藏事的人，作为一种介绍……这书出版后，倘能因之而使读者对于西藏得到精确的概念和轮廓，并进一步引起国人研究西藏问题的同情，然后按照中山先生扶助国内弱小民族的指示作去，那就是作者的真意，也就是作者无上的光荣了（同上）。

谢、王二氏在书中抨击和揭露了英国图谋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批评了政府的无能和举止失当，著书的主要目的是向国人介绍“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发展过程与问题实质。

综上，五位作者写作目的虽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家国情怀。特别是在自序中，“国家”、“国民”、“国人”等词汇频繁出现，甚至提到“大中华民族”，其背后潜藏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正越来越清晰。这种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的崭新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他们对“西藏”的理解。

（二）五位作者对“西藏”概念的论述

1. “西藏”名称的由来

对于“西藏”一词，各家在开篇均作了一番解释，详略不一，¹ 见解大致相同，即“西藏”这一概念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

王著中只简略提到：

西藏初号秃髮，唐宋曰吐蕃，元曰西蕃，明曰乌斯藏，至清始称西藏（王勤堉，1929:1）。

王氏与其他四人的不同之处是提到了“西番”这一概念。华著则提到了“西藏”与“藏”的关系及地名与族名、自称与他称的问题，指出：

西藏之名称，源于境内之藏部，及位于全国之西而名之，简称曰藏。藏人自称则曰伯特友尔（Bod yul），伯特者，乃其部族之名称，而友尔者，国家之义也²……入清后，始名西藏，以迄于今。其人则谓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今西人称西藏曰（Tibet）者，即土伯特一音之转也（华企云，1930:1）。

陈著对名称问题论述稍详，主要观点与谢著类似，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指出了“西藏”一名出现的具体时间：

到清代雍正年间，西藏一名才出现，那便是乌斯藏或卫藏的简称（陈健夫，1935:2）。

陈氏没有给出其说法的出处，但在注释中说：

雍正初年，清廷平定西藏，派果亲王入藏以后始有西藏一名，地偏西方，因有斯名（同上：12）。

对名称问题论述最详尽的是谢彬，用了四页的篇幅，并引美国人洛克喜尔（Rockhill，现通常译作柔克义）和日本人寺本氏（即寺本婉雅）的研究³ 来说明。主要观点是，第一，西藏既是种族的名称，同时也是土地的名称；第二，土伯特、图伯特、土蕃等诸译名都是吐蕃的转音；第三，元明所称的乌斯藏指卫，是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不代表西藏全体，如果“卫”、“藏”合称，并入后藏诸地，才能总括西藏全体；第四，现在西藏一名起于清代以后，是乌斯藏或卫藏的略称，包括了今天西藏的全境，因为在中国西方，历史上有西番一词，故定名西藏；第五，西藏一名刚出现时没有前藏后藏的划分（谢彬，1930:1-4）。

¹ 秦著涉及极简，略去不谈。

² 此处不确，藏语 yul（友尔）有三义，1. 地方，境域，区域；2. 家，家乡；3. 境。（《藏汉词典》，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编，1996，第 809 页。），有“国家”之义的说法可能来自日本人寺本婉雅的说法（见谢著第 2 页）。

³ 参见寺本婉雅，《藏语语法》，京都：内外出版，1929。



上述四人关于西藏地名沿革的论述多较简略，主要参考的文献是《大清一统志》、《卫藏通志》等数种，其中谢彬还引述了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同今天学者对西藏地名的考证相比（参见牙含章，1980；蔡志纯，1984, 2007），上述四位论述多有不确切的地方，但基本上符合史实，特别是反映了民国时期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

名称问题看似微小，其实背后牵扯的历史极为复杂，与政治也有牵涉。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观看了话剧《文成公主》之后，曾向历史学家吴晗提出“吐蕃”、“多甘”、“乌斯藏”和“西藏”等名词的演变和语源问题，指示一定要弄清楚（参见牙含章，1980：3）。

綜上述，可以发现今天汉语语境中的“西藏”与英语中的“Tibet”似应来自两个不同的系统。一方面，上述民国时期的学者均认为“西藏”之名来自“卫藏”，卫藏就是乌斯藏，这种观点反映了中国藏区历史演变和行政沿革的实际，有大量文献可考，民国知识分子秉承了这一传统，并成为今天中国人理解“西藏”概念的基础；另一方面，华氏提到西人称西藏为“Tibet”，来自“土伯特”的转音，牙含章先生考证西方的“Tibet”是学自唐朝时阿拉伯商人对西藏的称呼“Tibbat”，阿拉伯商人把西藏叫做“Tibbat”又是根据唐人把西藏叫做“吐蕃”而学来的（同上，4）。显然“乌斯藏”和“吐蕃”不是一个时期的概念，所指地理范围也差异很大。今天在西藏研究中经常碰到“西藏”与“Tibet”对译的困难，中外学者的理解差异颇大，应该跟这两个概念不同的语源有关。现在在汉语语境中，西藏与卫藏的大体对应是很自然的，而在西语中，“Tibet”总是倾向于与整个藏区对应，造成中西之间沟通理解上的误差。如果再引入藏语的语境，情形就更为复杂。今天藏语中与汉语“藏”对应的藏文词是 Bod, Bodpa 指所有藏族人，Bod Jongs 专指现代行政意义上的西藏，Gtsang 专指后藏日喀则地区。就笔者的观察，今天在藏语拉萨话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发生用“藏”（Gtsang）代“蕃”（Bod）的情形，相反由于现代行政区划的影响，“蕃”（Bod）与“西藏”（Bod Jongs）在口语中的对应趋势越来越强了，而对其他藏区的称呼主要使用 Amdo（安多）和 Kham（康）的概念。牙含章先生认为，“吐蕃”一词最开始就是指现在的西藏地方，后来因为“吐蕃”占领了青海、西康等地，就把占领下的土地和人民都叫做“吐蕃”（同上）。綜上可见，地名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的，不应以静止的眼光看待。国外总有人主张将“西藏”定义为整个“藏区”，就是没有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西藏”的典型表现。名称的问题与地域范围直接相关，下面再看对西藏范围的界定和争论。

2. 西藏的范围

西藏的地域范围历来是西藏问题中的焦点，其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国内外对于西藏范围的界定仍存在很大争议。五位作者对西藏的范围界定，从历史到民国当时都有涉及，且各家说法不尽相同。主要关注的焦点有：一，西藏的四界；二，西藏的组成部分；三，康藏/川藏分界。

(1) 西藏的四界

东接四川，川边，北接青海，新疆，西南两部与英属哲孟雄及不丹尼泊尔两小国接壤（王勤培，1929:1）。

北接新疆，南通印度，东南与青海川滇诸省毗连，西北与印度克什米尔为邻（华企云，1930:1-2）。

东界四川，东南界云南，北接青海新疆，西南二部与英属印度缅甸比连，其中夹着不丹尼泊尔两小国（秦墨晒，1931:1）。

西藏的北部接新疆，南界印度，尼泊尔，布丹三国，东部与西康接壤，东北毗连青海，西北近克什米尔（陈健夫，1935:4）。

从上引可见，各家对西藏的北、西、南界说法较为一致，唯独在东界有出入。王氏与秦氏认为西藏东接四川，华氏与陈氏认为是东界川边和西康，特别是陈氏直接说明西藏东界西康，显然认为康区已经不属于西藏。王氏与秦氏的说法反映了当时西康尚未正式建省，行政地位上没有青海那么明确突出。



(2) 西藏的境域

对西藏境域组成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民国学人对“西藏”概念的理解。

1) 王氏的观点

王氏本人是地理学家，在其书中，三处提到西藏的范围。分别如下：第一处如上引，在民国时西藏主要指卫藏（“东接川边”），并于其后论证说：

……故以历史的关系而论，川边无论如何，不应划归西藏，可无俟言（王勤培，91）。

第二处：

初，土伯特分四部，东部曰康曰青海，西部曰卫曰藏（同上，1）。

此处应该指明代及以前的情况；第三处：

西藏旧分四部，曰卫，曰藏，曰阿里，曰喀木（同上，43）。

作者此处参考的是清末刻印的《皇朝藩属舆地全书·西藏源流考》，实际与《大清一统志》的说法完全一样，指的是清代的情况。王氏书中给出的上述大中小三种关于西藏范围的界定很有代表性，是三种典型的说法。

2) 华氏的观点

华企云认为西藏实分为四部，即康、卫、藏、阿里。他反对将青海纳入西藏，特别指出：

青海居西藏之东北，在我地图上与西藏实为两地；但因英人久蓄图藏之野心故，在英国地图上青海已包括于西藏之内，以为中英交涉西藏问题时可为拓地之谋也（华企云，2）。

华氏在此已经将中西之间的西藏概念之争做了展示，并剖析了英人的目的。他将康归入西藏是为了对应他“西藏古为三危地”的观点，在后文又说“西藏东半部地，清季划为川边所辖，今则已建西康行省”（同上，3）。因此认为当时西康已不属于西藏。

3) 秦氏的观点

秦氏认为，原本西藏全地，可分三部，就是康、卫、藏，分别称前藏、中藏和后藏¹（秦墨晒，1）。后清代时康已改土归流，民国建立后改为川边特别区，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西康行省（同上）。在关于川藏交通的论述中，又明确说到：

从打箭炉到巴塘西边的南墩向来归四川省管辖，是西康境界……从南墩西上，经过察木多到察罗松多，原来是各土司辖境，清初归附，雍正年间赐给达赖喇嘛，本不是西藏的故土，是喀木故境……（同上，6）。

可见秦氏认为东部康区向来不归西藏，西部康区原本也不归西藏，只是后来赐给达赖喇嘛。

4) 谢氏的观点

对西藏地域组成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刻自觉并着力加以剖析的是谢与陈两位。谢氏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考证并指出了汉藏之间关于西藏地域问题的分歧。他指出，

至于西藏领域，究以何处为止境？则中国人与西藏人，均各有其所指，且有非常之差异焉。（谢彬，5）

对康与汉（内地）、藏的互相统属关系，谢氏认为，

至于西藏与内地分界何在？虽只有中国人以宁静山为川藏之界一说，然就西藏人与外国人，所谓丹达山为康藏分界一点观之，康实清代之固有领土，康之西界既止于丹达山，则康已非西藏版图，实为中国内地矣。惟是外人强词夺理，恒谓康为西藏之一部；即中国人，亦间有持此说者。故丹达山为康藏分界，西藏人，外国人虽有此说，但未承认康为中国内地也。（同上，7-8）

谢氏通过自己的论证认为康在清代就属于中国内地。

5) 陈氏的观点

西藏境内分三大区，前藏、后藏、阿里……普通一般人，尤其是侵略者，多以为现在的西藏包括西康、青海，这种错误是可怕的，西藏只是西藏，并没有包括西康、青海在内，我们一究其

¹ 秦氏此处应该是引清代魏源撰《圣武记·外藩》中的说法，指的是清代的情况。



历史根源，自当明白的。(陈健夫，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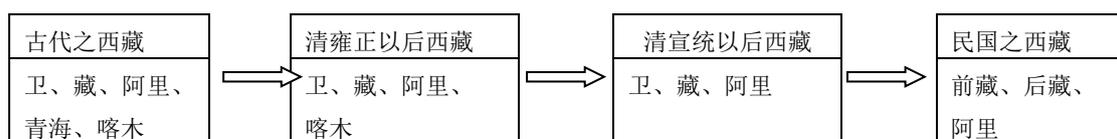
接下来，陈氏对西藏境域的历史沿革做了细致出色地考证。引证清代文献，证明西藏在古时确是“唐古忒有卫藏青海喀木四部落”，同时引藏文古文献¹说明：

古时的西藏包有上三部（阿里），中四部（卫藏），下六部（西康，青海）（同上，5）。

随即作者论证说：

所以这种史实我们不能否认，更不用这样，因为这种历史的沿革是一回平凡的事，古时的行政区域怎样能适应今日的中华民国呢？那能说今日的西藏仍旧包括青海，西康哩（同上）！

陈氏通过引证文献指出，青海和西康在清代，主要是雍正和宣统年间，已经分别脱离了对西藏的隶属关系。陈氏在书中做图表如下：



(同上，7)

在上述五人中，陈氏的论证最为完备，对西藏境域沿革的观点与今天的学者已经很接近。

民国时期正是清帝国向现代中国急遽转变的时期。上述民国知识分子已经深刻感受到，中国正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干涉，经济上的渗透，还有话语权上的垄断。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自觉地同西方争夺对“西藏”内涵的定义权。五位作者从古今文献中寻找证据，一致认为“康”不属于西藏，没有一人将西藏与吐蕃的范围相等同。特别是陈健夫，从历史上的政治隶属关系演变着眼来论证青海、西康不属于西藏，后来的中国学者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如马戎教授在其1996年出版的《西藏的人口与社会》一书中认为：

藏族与“西藏”是两个概念。从元朝直至今日，当我们谈到“西藏”的时候，指的大致是目前西藏自治区的地域范围，也就是传统的“卫藏地区”（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即清朝时达赖噶厦政府在行政上管理、收税的区域（马戎，1996:25）。海外新闻机构和学者则长期受达赖集团和流亡藏人宣传的影响，当他们谈论“西藏”（Tibet）时指的是达赖宣称的“大西藏”，即不仅包括目前的西藏自治区，还包括几乎青海全省、川西、甘南、云南西北等藏族居住区域（约220万平方公里）（同上，51）。

马戎教授非常清晰地指出了两种“西藏”概念的差异，在其研究中则用“藏族传统居住区”这一概念指代西方的“西藏”概念。但争论不会停止，当代英国著名藏学家安德鲁·马丁·费舍尔（Andrew Martin Fischer）在其2005年出版的专著中，在解释TAR（西藏自治区）时，仍然认为：

中国通常将西藏自治区说成是西藏（Tibet），尽管其仅占官方承认的中国藏族地区和藏族人口的不到一半（Fischer, 2005:x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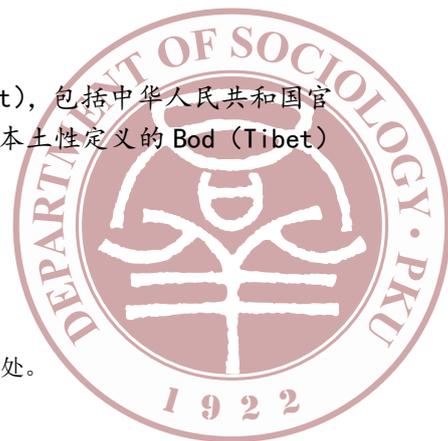
在对其书中的“藏族地区”概念进行注解时又说，

本书所说的“中国西部藏族地区”，或更通常说的“西藏”（Tibet），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定义的西藏（Ch. Zang）自治区和被自称为Bodpa（Tibetans）的人本土性定义的Bod（Tibet）（同上，xxii-xxiii）。

今后中西之间两种“西藏”概念的争论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3. 康藏划界问题——对“康”的界定

¹ 这是五部文献中唯一引用藏文的，且在书中录入了藏文原文，但未给出文献出处。



即使对西藏的地域组成观点一致，对其具体边界的界定又会产生歧义。五位作者大都主张以丹达山为康藏界，细究又各有不同。

(1) 谢氏观点

谢氏在书中批驳了以前流行的康藏以宁静山为界的说法，肯定了以丹达山为界一说，但其后谢氏又指出，在川滇边务大臣未设以前，即使在宁静山以东属于内地的康区，对清庭也只是有朝贡的虚名而没有臣服之实。都是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势力所及仅是赴西藏的交通沿线。因此，如果非要说中藏的交界线是丹达山而不是宁静山，那么就与藏人主张的以打箭炉外的雅砻江或邛州为界一样，都是无意义之谈。既然西藏属于中国领土，就没有争执的必要，根据主权行使的方便来划就可以了（谢彬，9-12）。

(2) 王氏观点

王勤墉也持丹达山为界一说，

西康疆域，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计三千余里，南与云南之维西中甸两厅接壤，北逾俄落色达野番，与甘肃交界，计四千余里。其西南过杂榆外，经野番境，即为英国属地。境域之广倍于川而等于藏（王勤墉，2）。

(3) 华氏观点

华企云认为康藏的交界处在丹达山，

西藏东半部地，清季划为川边所辖，今则已建西康行省。其疆域北接青海，东接四川，西连西藏，南界云南及印度之阿萨密。其西与卫相接，有丹达地，是为康卫交界点。往昔丹达山往东之居民，恒自称为康坝娃，其西之居民，则自称为藏坝娃，是其交界之明证。（华企云，3-5）。

华氏也提到了雍正三年周瑛勘界时忽以宁静山为川藏界一事，但认为，

“然康藏准确之界线固在丹达山也”（同上，5）。

其后在考证西康疆域沿革时，华氏又引述前人文献，指出：

昔之康，乃今昌都（察木多）地方……至于今日所称之“康”，则实指迺清季世边务大臣所经营之川边而言，其地域则南接云南，北连青海，东起泸定，西迄丹达山。其间南北界已毫无争议，惟西迄丹达，毗连西藏地方，则时起纠葛（华企云，119）。

华氏意在说明“康”的范围也随时间在变化。此处批驳以宁静山为界一说时，华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质问：

宁静山以东已同内地，若其西地不属康而属藏，则将置康地于何处耶（同上）？

这一质问恰好反映了康在汉藏之间的尴尬地位，在内地与西藏关于康的论争中，康已被化为无形。最后，华氏又提出以江达为界的问题，

惟是宣统二年，边军征藏时，已直抵江达，故严格言之，今日康藏之界限，实以江达为鸿沟矣（同上，120）。

(4) 秦氏观点

秦氏在书中认为从打箭炉到南墩（宁静山附近）属西康境，南墩到察罗松多（在丹达山西50里处）是喀木故境（秦墨晒，6）。可见秦氏认为的康藏界限也在丹达山一带，只是当时不在西康的控制下。

(5) 陈氏观点

陈健夫对康藏划界问题论述较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同于前述三人。首先，陈氏考证了康藏界限的历史沿革，指出：

康藏的界址，是民国以来康藏纠纷的一重要问题，盖自明末至清雍正初年以努卜公拉山为界，自雍正初年至清末是大都在宁静山以西，自清末至民国六年以江达为界，自后康藏迭起纠纷，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由现在实际情形谈，康藏双方是以金沙江为界的，因为两军隔江相恃之故（陈健夫，6）！



在后文，又列出一般对康藏界限的三种主张，即赵尔丰、尹昌衡及当时的蒙藏委员会主张以江达为界；傅嵩、九世班禅、驻藏长官蒋致余主张以丹达山为界；刘文辉主张如果中央对藏有确定把握的话，可以金沙江为界。宁静山一说已经不再被提及。接着，陈氏批评了对康藏划界问题的“空谈”，剖析了实情，

著者以为，康藏界址在目前无法使它彻底解决，不能根据一固定的主张去实行，这是限于事实……所以康藏界址问题的解决，并不是空谈白论的文章所能济事的，我们要有一个适合实际的办法去进行（陈健夫，184—185）。

最后，陈氏提出了自己的划界方案：

“中央未恢复西藏统治权以前的康藏界址”……主张维持现状，以金沙江为界，但千万不可由中央政府明文订定以确定西康疆域，免得妨碍西康未来的省治，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协定（陈健夫，185—187）。

“中央恢复西藏统治权以后的康藏界址”，主张以丹达山为康藏界址，无论由经济，政治，历史各方面言之，对于康藏双方都无妨碍，能使双方有机会同样的发展，这种理由并不深邃，试揭开康藏地图一看便会明白。所以我主张康藏应以丹达山为界（同上，187）。

陈氏本着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来看待康藏界限，将国家力量看做解决问题的关键，力量达不到就只能维持现状，否则大发议论也只是空谈。事实上，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也确实印证了陈氏的观点，今天丹达山（位在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城西南）一带仍是康区与卫藏的分界，而川藏的分界还是在金沙江。

综上所述，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上述学者的总体取向是逐渐将“康”从“西藏”的范畴中剥离出来，再将康藏的边界定在丹达山甚至到江达一带。从今天看，实际上在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之前，所谓“康”主要是一个传统的地域文化概念，经由藏语翻译而来。此时正式的行政边界是川藏边界，从晚清时期绘制的地图中可以看到，川藏分界点多在宁静山以西一线。¹ 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之后，特别是1914年川边特别区成立，“康”逐渐从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区域向行政区域转变，随之康藏边界也逐渐行政化。由此，作为传统康区与卫藏分界的丹达山被转化为西康与西藏的交界点。

四、结语

“西藏问题”从产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百年以来，一代代有志于此的学者志士都在苦苦研究和思索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然而直至今日，“西藏问题”仍然非常严峻地摆在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面前。今天，当我们再思考西藏问题时，仍然需要回到原点，从梳理基本概念着手。前人的研究与著述不仅仅为今人提供了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当时著者思考的记录，为今天做关于西藏的文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从民国时期的五本著作来看，作者们对“西藏”名称的沿革及其内涵的理解都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当面临来自英帝国的话语挑战时，这些知识分子纷纷从古籍文献中寻找辩护的证据，以图确立对“西藏”概念的定义权，并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合法性论证。论证的结果就是：一，引证文献，从名称上确立西藏与卫藏的对应关系，将安多和康视作与西藏并列的地域存在；二，从行政沿革上明确清雍正以后青海、东部康区、云南藏区归内地直接管辖的事实，证明它们不属于西藏；三，从改土归流的角度说明赵尔丰曾到达的江达或传统康藏分界的丹达山为西藏与西康的交界点，即西藏与内地（省份）的交界点。通过上述三点，已经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在边疆面临危机的大背景下，除了向传统寻求话语资源之外，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参与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构建。诚如青年陈健夫所言，“一个国家假若是对于自己的领土不能

¹ 参见周士棠，孙海环编辑，《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印行，新学会社藏版，第三十一图。

施行统治权的话，那么她的领土的主权便要无形的消失，这是一回最危险的事”（陈健夫，165）。陈氏已经看到如果中国不从“天下”走向“民族国家”，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理解“西藏”和思考“西藏问题”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目前仍然处于“民族-国家”的未完成状态，是继续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还是回归所谓的“跨体系社会”，¹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上。对于这一宏大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决定“西藏问题”未来的走向。

参考文献：

- 蔡志纯，1984，“释西藏名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 蔡志纯，2007，“从藏博到西藏地名演变考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 陈健夫，1935，《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 陈玉堂编著，2005，《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侯夏，1992，“近代中国边疆史地学家谢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
- 华企云，1930，《西藏问题》，上海：大东书局。
- 刘国武，2010，“谢彬与西藏研究述评”，《船山学刊》，2010年第1期。
- 马大正，1996，“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 马戎，1996，《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北京：同心出版社。
- 秦墨晒，1931，《西藏问题》，南京印刷公司铅印本。
- 沈卫荣，2010，“也谈东方主义与‘西藏问题’”，《天涯》，2010年第4期。
- 汪晖，2011，《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三联书店。
- 王勤培，《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 王尧、王启龙、邓小咏，2003，《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 谢彬，1930，《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
- 谢振声，2009，“最早提出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王鞠侯先生”，《京华宁波人》2009年第3期。
- 徐友春主编，2007，《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
- 牙含章，1980，“关于‘吐蕃’、‘多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 杨昌泰，2007，“著名爱国学者谢彬的生平与贡献”，《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 叶罗娜，2007，“新亚细亚学会与《新亚细亚》月刊”，《赤峰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 贞兼绫子编，钟美珠译，1986，《西藏研究文献目录》，中州古籍出版社。
- 周家珍编著，2000，《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法律出版社。
- 周士棠，孙海环编辑，《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印行，新学会社藏版，第三十一图。
- Fischer, Andrew Martin, 2005a, *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 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 Copenhagen: NIAS Press.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参见汪晖，《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载于《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三联书店，2011，第147—204页。

